



文高岂止阐古意 春来新叶满城隅

——记著名经济学家石世奇先生

□ 周建波

石世奇先生（1932—2012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跨度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石世奇先生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内容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改进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回顾石先生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和学术贡献，对总结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

用现代经济理论系统归纳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石世奇先生师从赵靖先生，参与了《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四卷本、《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教程》等著作的编撰工作，为建立和完善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体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石世奇先生主张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和分析古人的思想，即“古人思想现代化”。他系统梳理了先秦诸子的经济思想，指出，“先秦各家的经济思想，包括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经济思想都不仅是从人的欲望出发，而且是从人的欲望和欲望的满足的关系，即荀子所说的‘欲多而物寡’出发的”。这就是西方现代经济学所指的欲望与稀缺的关系。石先生认为，先秦各家不仅提出了自己对欲望与稀缺的理解，还提出了各自的协调解决方案，而这些主张上的差别，根本上是由所处的社会背景（春秋早期和战国时代）和自身立场的不同决定的。儒、墨、道看到了人的欲望和物的稀缺的对立性，主张使整个社会和谐安宁，儒家有大同小康的理想社会、道家有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墨家有救民于水火的理想。而法家则主张通过刑赏来满足不同人的欲望和需求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石先生的这一观点继承了赵靖先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探讨，并且在探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思想的耦合上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四卷本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被奉为圭臬，作为副主编的石世奇先生，对该书的很多观点和见解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秦到西汉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时期，其间形成的诸多观点构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框架，尤以“善因论”和“轻重论”最为重要。石先生分别就这两种代表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他明确指出：“善因论是一种和轻重论不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它反对封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过多干预和控

制，它的基本主张是放任。”并且将司马迁这一思想的形成原因归结为其作为庶民地主商人利益的代表，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对汉初至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发展和政策的理论总结。他进一步对司马迁提出“善因论”主张的理论依据进行了探讨，指出司马迁认为经济发展有内在动力、各部门分工自然形成、社会经济具有内在的调节机制。这些分析为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完整的思路，并且被继承沿用至今。

与“善因论”相对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还存在着主张政府干预的“轻重论”，并且这一主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封建统治者所采纳，对封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石先生在《〈管子〉轻重论初探》一文指出：“‘轻重论’的实质，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通过垄断工商业推行经济上的专制主义。”并将这种理论理解为封建国家利用商品货币的“轻重变化”，对商品货币流通进行调节、干预，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的。全文从商品的价格、货币与五谷、货币与万物的轻重关系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轻重论”的内容，并且分析了封建王朝运用轻重之术的几种方法，如控制经济、掌握谷币、尽可能垄断控制各种商品、操纵市场贱买贵卖等。相比该文在理论层面的探讨，石先生在《桑弘羊的经济思想》一文中，则侧重分析了“轻重论”在汉武帝一朝的实践效果。文章将武帝干预社会经济的措施归结为建立统一稳定的货币制度，推行告缗令，实行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设置均输、平准等四项措施，并从国家财富和社会经济发展两个方面考察了桑弘羊利用轻重之术治理国家产生的效果。石先生用现代经济理论系统归纳了“善因论”和“轻重论”等传统主流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得到了国内学者的肯定和认同，并且成为了该领域研究的范式。

拓展了中国商业管理思想的研究领域和方法

石世奇先生系统研究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治生之学”，拓展了学界在中国商业管理思想上的研究。他于198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治生之学的黄金时代》一文中指出：“春秋末至西汉初，治生之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以增殖货币财富为研究对象。”他认为，治生之学主要是商业经营学，广义上也包括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生息资本的经营。石先生将这一时期治生之学的主要内容归纳为经营行业、地点和方式的选



择，经营实际，资金和用人等问题，围绕司马迁著述的《史记》并结合范蠡、白圭等富商巨贾的经营之道展开了详尽的研究。认为春秋末至西汉前期之所以成为治生之学的黄金时期，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对工商业干预的减少，学术思想活跃和好贾趋利、舍本末求的社会风气共同造成的。文章将经营时机分为自然的时机、政治上的变动和市场上商品价格变化的时机。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阐述了“欲长线，取下谷”和“廉贾归富”两种经营理念的意义。这种用现代经济学理论阐释中国传统经营理念的分析范式成为之后中国商业管理思想研究的规范，也是石先生在该领域研究上的贡献。

石先生还将对商业管理思想的分析拓展到明清之际的封建商帮，对中国封建四大商帮之一的徽商，围绕着“贾而好儒”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将徽商的“儒行、儒风”总结为重视做人 and 经营之道、经商的同时读书学习、热心教育文化事业等三个方面。徽商重视育人之道，既善于求利，又讲究精诚合作，体现出高尚的品格。其喜好传统文化、热衷读书是因为通过读书学习，既能提高自身修养品德、提升文化素养，又在以史为鉴中提高了经营能力。而徽商“贾儒”的特点更通过设立书院、资助考生等举措，对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得到了证明。石先生认为，徽商的“儒行”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有力的道德保障，指出研究徽商对于理解历史和指导改革的重要意义。石先生对明清商帮的研究，是继赵靖先生对晋商的研究之后，现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对传统中国商业管理思想的又一份瑰宝。

石世奇

祖籍浙江绍兴，1932年4月出生於天津。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51年4月，调至北京市政策研究室工作。1960年复学回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院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代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理事。

补充、完善了系统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链条

先秦到西汉初年是中国社会传统经济思想的黄金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量精彩的经济思想并喷般涌现，奠定了之后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方向。正由于此，传统的中国经济思想研究多集中在对先秦至西汉初年，虽然也不断有学者尝试对其他时期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但成果较为分散，远没有将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串成一个完整的链条。

石世奇先生在担任副主编的四卷本《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与赵靖先生一起，对补充完善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链条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石先生对东汉的桓谭、王充、班固、王符、崔寔，唐代的白居易，南宋的陈亮、叶适，明代的丘浚（濬）、王阳明，清代的魏源、许楣、许铤等人的经济思想进行了专篇的考察和分析。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经济思想的分析，他不仅完成了《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的编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补充完善了整个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链条，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比如，石世奇先生对东汉前期代表性的三位思想家桓谭、王充、班固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分析，其中重点分析了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的经济思想，文章将王充著作中有关经济问题归纳为以下几类：1.重视满足人民基本的物质需要；2.关心社会贫富问题；3.论述了增加投入对生产的作用；4.关于交换和价格的一些命题。文章认为，王充对社会发展和经济问题的认识，与其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指出王充在考察社会时，

非常重视经济和物质资料的生产作用并且提出了今胜于古的历史进化观。石先生对于王充经济思想的研究，很好地弥补了前人在东汉经济思想研究上的空白，将其哲学观与经济思想相结合的分析模式，也开辟了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新方法。

再比如，石世奇先生提出了对白居易经济思想的独到理解——后人多认为白居易重轻重之术，却多忽视了其中的黄老思想。他认为，“黄老之道与轻重之术相结合，构成白居易经济思想的一大特点”。白居易把“人情俭朴，时俗清和”视为理想的社会风气，主张“从宜随俗，政之要也”，“尚宽简，务清静”，这些都体现出他对黄老之学的信仰。但由于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的原因，社会经济往往出现不平衡，白居易还是主张政府运用轻重之术，对社会活动进行调节。白居易所主张的调节社会经济，实际上是围绕货币和商品的价格之比——即轻重之术来调整农工商三者间的利益关系。白居易调节社会经济的思想，虽然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轻重论”，但本质并不是以增加封建国家的收入为目的，而是旨在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农工商之间利益的和谐，“即所谓‘百货流通，四人交利’”。石先生的结论是：吸收“轻重论”调节社会经济的方法，而摒弃国家直接参与工商业经营的做法，是黄老之道与轻重之术相结合的结果。

再比如，石世奇先生对南宋时期分属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的功利之学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陈亮和叶适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两人的功利之学实际是抗金复土和国家富强思想的体现。两人相较，陈亮在经济问题上的论述较少，主要

涉及欲望问题、农商关系及富民问题、土地问题等几个方面。而叶适在经济问题上，不但多有议论，而且有所作为，在探讨中，对一些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进行了公开驳斥，其反传统的思想具体表现为：1.宣扬功利主义；2.反对美化井田制和复井田的主张；3.主张“保富”，反对抑兼并；4.主张“扶持商贾”，对“重本抑末”论进行了公开批判。除了上述经济思想，叶适也对理财问题从意义、指导思想和方法等方面有较多正面论述和阐发，但这里的理财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家庭开支，而是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同样，由于心怀“国家治道之兴废”的远大“功利”，叶适为理财正名的同时，又可以对财恃超然态度。

石世奇先生分别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角度，对传统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链条作出了饶有意义的补充和完善，有着重要的价值。

引导学科发展，强调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当今的借鉴意义

石世奇先生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还积极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当代改革发展的现实相结合，促进该领域不断与社会前沿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新的生命。

在发表于1995年《中国经济学说辉煌的去与灿烂的未来》一文中，石世奇先生回顾了中国经济学说辉煌过去。文章指出，“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整个国家经济、财政的富国之术以及研究个人和家庭从事生产和经营以发家致富的治生之学”。在此基础上，石先生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前景作了乐观的展望，并期待更多受过国内外良好、严格训练的青年学者能够加入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来。

他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建设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意义，具体而言：1.古代经济思想中对道德的重视具有规范市场竞争的作用；2.“轻重论”“善因论”等思想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具有启发借鉴作用；3.发达完善的治生之学对于企业经营管理具有启发借鉴作用。通过以上观点，石世奇先生强调，中国古典经济思想是丰富而包含精华的，并且对当代经济发展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石世奇先生一生不慕名利、潜心治学，自20世纪60年代始，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对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冷学”的研究，为其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如今，先生桃李满天下，子弟早已遍及四海，在今天，继承和发扬先生这种扎实治学、不为名利所惑的精神，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回顾石世奇先生的学术研究和贡献，不仅仅要学习先生研究问题的方法，更要将先生的治学为人之道发扬光大。



深耕中国经济思想史

□ 熊金武

经济思想史是关于历史上经济思想和理论的更高层次上的经济学科，通过整理归纳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来探索经济思想发展规律。中国经济思想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从神话传说中的经济思想，到《管子》《周礼》《盐铁论》《皇朝经世文编》等文本中的经济思想，再到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制度变革中的经济思想，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绵延不绝，涵盖了社会经济的各方面，构成了中国古代经济繁荣的坚实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包括了一整套独特的话语体系，在整个东亚地区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这种独特性标志着中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独特路径是独立并行的。中国经济思想是于本土自生自发的，具有内生性的独立发展轨迹。这也正是中国经济思想深厚传统之所在。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20世纪初就开始出现的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采集前哲所论，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以示中国经济思想之“壮

观”。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则是向西方社会介绍了儒家代表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已经初步成形。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等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打下基础。不过，中国经济思想史大发展是在1949年后。中国社科院巫宝三、上海财经大学胡寄窗、北京大学赵靖和石世奇等先生为学科开创起到了奠基作用并于1980年成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到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恢复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的博士学位点获批。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赵靖担任主编、石世奇担任副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四卷本等通史著作作为学科发展的奠基性著作。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人用扎实的史料向世界说明中国传统社会光辉灿烂的经济思想。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已经在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形成了扎实的学科基础，并不断发展创

新。第一，研究范围从古代拓展到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和现代中国经济思想，尤其是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理论创新。第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也越来越走向国际化，与其他国家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合作交流，向世界传播中国经济思想。第三，研究方法上，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不仅是用历史研究方法梳理历史上的中国经济思想，更尝试用统计、科学哲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工具探索经济思想发展规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变得越来越成熟，拥有一个稳定的充满活力的学术共同体。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有利于经济学理论创新。在历史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起源就提供了养分。历史上东学西渐的案例不胜枚举。法国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中国渊源就是典型案例。张培刚、林森代表的近代中国海外留学生研究成果对现代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等学科都作出了突出贡献。需要注意的是，张培刚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众星云集的一个典型

代表，更多的中国经济思想研究成果并没有传播到英文世界，却对中国20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发挥指导作用。

构建中国特色经济理论需要大力发展中国经济思想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中国特色经济理论必然是扎根于深厚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文化中的。中国经济思想是理论经济学中中国因素的最集中体现，而中国经济思想史正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的专门学科。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基本使命。第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利于将中国独立于西方经济理论发展路径的特色部分提炼出来，继承这些传统可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根基于深厚的历史渊源。第二，整理和归纳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建设实践经验，让中国的

经验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找到方位，提炼出独特的理论要素，而这正是中国特色经济理论的关键。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传播和本土化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让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统一起来。

为了完成构建中国特色经济理论的历史任务，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须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等方面作出一定的改进。虽然在过去的1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过相对于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经济理论的学科定位而言，我们依然可以引用胡寄窗先生的话，中国经济思想史“基本上还是一片待开垦的园地”，值得深耕。秉承前辈学人开创的学术道路，保护开放的学术视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自然能够在构建中国特色经济理论中大放光彩。